

感恩·敬畏·珍惜——国图四十年工作与研究点滴

□ 林世田讲授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 黄 珊整理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一、感恩：与敦煌学结缘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和推广组年轻同仁交流，谈一谈自己在图书馆40年的工作和研究，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总结。

我1985年入职，到明年退休就四十年了。回想到图书馆报道宛如昨日，当时到火车站接我的是人事科的孟欣老师和车队的郝瑞平老师，郝瑞平老师后来到了古籍馆方志组工作，我们成为一个部门的同事，也见证了郝瑞平日积月累，卓然成为方志研究专家。回顾四十年的经历尽管有坎坷，但更多的是感恩。首先，感恩国家图书馆给我们提供了如此广阔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其次，感恩国家图书馆珍贵的馆藏，给予了我们成长的土壤，学习的养分。最后，感恩一路上提携、帮助、鼓励我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

1985年7月13日上班的第一天，我去了典藏阅览部的中文社科阅览室实习。那时的中文社科阅览室在临琼楼一层南边，从民国时期的平装书一直到最新的社科书，坐拥书城的感觉特别幸福。感恩一年半的实习时间，我除了每天接待读者和整架，其余时间都用来看书。作为一个本科生，我当时没有什么学术方向，前几年就是靠自己摸索。但是我对敦煌感兴趣，因为在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上过这门课，有一些了解。当时善本特藏部正好还有个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以下简称“敦煌组”）刚成立不久，我就一直想到敦煌组工作，事先看了很多书，作了充分的准备。

那年我们正式分配工作之前考英语。因为当时西文编目组（以下简称“西编组”）缺人，积压的书特别多，通过考试为西编组选人，这是后来听西编组老组长刘光伟先生说的。我的英语口语比较差，但是笔试还算可以，就阴差阳错地去了西编组。在西编组，我能接触大量外文书，也遇到了辅仁大学毕业的刘东元老先生，精通多种外语，而且历史知识很丰富。当时我正好在给《斯文·赫定传》这本书编目，在兰州大学时我也读过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的著作，便和刘东元先生谈起了斯文·赫定。老先生说当年他在团城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工作室见过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查团带回来的居延汉简等文物都存放在北海团城。我们馆也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理事单位，当时这批居延汉简调拨给我们馆。这批2万多枚汉简如果在我们馆能够保留下来，可以和馆藏的甲骨、敦煌遗书、宋元明清珍贵古籍一起，组成完整的书籍史。但很可惜这批汉简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借去研究，后来运到了台湾，我们就和这批汉简失之交臂。

我当时还没有研究方向，刘老先生说你就把斯文·赫定作为近期目标吧！那时斯文·赫定的著作以及西北科学考察团丛书属于“蓝参”，收藏在柏林寺的第二阅览室部。我利用周日到柏林寺借书阅览，把有用的部分复制了。当时的复制费很高，我工资很低，为了这批资

料节衣缩食了几个月。当时我住在馆里的集体宿舍，夜以继日地翻译了大量的资料。后来虽然发表了一些文章，但说起来根本不算学术论文。当时每次到柏林寺，径直地去阅览室看书，没有认真参观这个古色古香的寺院。2000年到善本部工作后才知道1966年红卫兵捣毁柏林寺大佛，散落出一批《磉砂藏》，完整的部分堆在大殿中的壁角和书架顶上，还有不少碎片已经和垃圾一同清理了。因缘巧合，丁瑜先生到柏林寺办事，在柏林寺垃圾中发现了《磉砂藏》扉画残片，便立刻将此批佛经连同从垃圾中收集的残片运回善本书库，得到精心的保护。1987年白石桥新馆建成后，柏林寺移交给了文化部，再来看时大门紧锁，已经进不去了。

在西编组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跟西编组的组长郝生源说我的兴趣还是在敦煌，经他的热情推荐，李致忠先生把我从西编组调到了善本特藏部敦煌组。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现改名边疆研究所）正好有一个项目要做斯文·赫定的相关题目，因为有了这些积累，就和他们一起合作写了一本《探险家斯文·赫定传》，是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在合作的过程中因为一些事不太愉快，心里郁闷，机缘巧合之下就跟我的师傅净慧老和尚在广济寺见面了。

老和尚对敦煌文献也特别关注，因为他是虚云大师的关门弟子，所以很关注敦煌文献里面的《坛经》。对敦煌文献的《坛经》，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周绍良先生是佛教文献、红学多个方面的学术大家，他说敦煌本的《坛经》是《坛经》的“原本”，意义和价值很高。敦煌遗书是写本时代的产物，都是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的東西，最晚也是宋代初年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版本都是我们库里所藏宋元以后版本的祖本。但是净慧老和尚深入研究以后，提出了比较客观的观点，他认为敦煌本《坛经》是一个节略本，一个摘抄本，不是完整本。他认为最完整的本子肯定是在曹溪，因为六祖惠能大师讲《坛经》是在广东韶州市的大梵寺（今天的大鉴禅寺）。因此净慧老和尚说原本应该在当地保存下来，敦煌本不过是一个不断传抄的节略本。

净慧老和尚说，研究敦煌一定要懂佛学。净慧老和尚说研究佛学要先从原始的佛教经典开始读，要读《四阿含》。对初学者来说，最好的《四阿含》版本是《佛光大藏经·阿含藏》，我通读了《四阿含》，撰写了笔记。当时星云大师有一个《十大弟子传》，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但是读完以后，我觉得仍然有很多内容可以增加。十大弟子的事迹都在《四阿含》里，都是佛和十大弟子之间的对话，就相当于《论语》。我想，能不能在目前的基础上把《四阿含》里面原始经典的有些东西做一个补充？我就写了《佛陀十大弟子传》。我现在之所以还能够研究佛教，对佛教还有一些认识，得益于净慧老和尚的教导。佛教是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把它当做生活的一种方式，融化到血液当中。这是净慧老和尚给我的启示。

对佛教有了深入了解以后，如何帮助我研究敦煌学呢？当时敦煌组有两个老先生，唐耕耦老先生和黄振华老先生，都是一流的专家。黄振华老先生退休之后，子女不在身边，我经常去拜访，从此就跟着他来做敦煌学真正的学术研究。

二、敬畏：虔敬的整理与审慎的研究

对敦煌文献和善本特藏，我们一定要抱有敬畏之心。它是中华民族的珍宝，也是研究时取之不竭的资源。一个文献，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所处的时空位置。敦煌文献属于纸质写本时期，正好是承前启后的时代，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们要了解文献，就一定要了解历史。敦煌遗书来之不易，没有罗振玉的奔走呼号，可能就没有我们馆现在的敦煌遗书。1909年他从伯希和那里了解到甘肃还有八九千卷遗书后十分着急，甚至愿意捐出个人薪水由学部购藏敦煌遗书，因此罗振玉先生对敦煌文献的保护居功至伟。敦煌遗书运到学部后，学部大员监守自盗，为了防止遗书继续流失，将这批遗书调拨给了刚刚成立一年多的京师图书馆。当时的京师图书馆还没有办馆场地。正是因为这批敦煌遗书，学部藉“庙产兴学”之风，借广化寺作为京师图书馆的馆舍。当时敦煌遗书放在广化寺后院的三间偏房里，房间又低又矮，里面放了十个柜子，有的有玻璃门，有的没有，有的用棉绳捆着，有的用麻绳捆着，缺乏经费和管理。

现在旧貌换新颜了，2004年敦煌遗书特藏库建成，制作了144个敦煌遗书专用楠木书柜，每柜摆放140个楠木书盒，底材选用樟木，每盒放置敦煌遗书1件，堪称世界一流，从根本上改变了敦煌遗书的保存条件。这不仅仅让敦煌遗书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而且《赵城金藏》也存放在这里，同样得到了最好的保护。敦煌遗书特藏库建设完成后，中外学者、媒体参观时纷纷交口称赞。

2000年敦煌组划归善本特藏部，敦煌组的文献的整理、揭示和研究，有了更好的条件，我也开始结合工作、结合馆藏敦煌遗书做了些微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是和萨仁高娃、刘波、李文洁、赵大莹、赵洪雅等老师一起合作完成，这里也凝聚了他们的心血。

（一）继从与敦煌《法华玄赞》及灵验故事的传播

为什么外来的佛教会得到中国的信众？这在敦煌遗书里面有最好的证明。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主要在上层社会流传，与黄老并祀，没有广泛传播。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连年战争，尸骨遍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的《法句譬喻经》是最早有纪年的一件敦煌遗书，它的题记写到：“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写讫。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被诛向二百人”。“甘露元年”是前秦的年号，前秦是由氐族建立的，“杂类”是指氐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许倬云先生认为华夏人称“汉人”，也是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以题记上写，汉人和氐族以外的其他的少数民族被杀了200人，希望他们得到解脱，“生生敬信三宝，无有退转”。假如时光回到了1600多年前的公元359年，我们眼看着同胞被杀，都会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佛教救苦救难的教义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慰藉，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佛教才在中国下层大规模流传开。

敦煌是东西方的十字路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都会。不管是商贸往来还是东来西往的僧人都要经过敦煌。2014年在国家典籍博物馆首展展出过一件《法华经》卷二（BD13802），卷末有朱笔题记，全文是“西天取经僧继从乾德六年（968）二月科记”，说明这件写经是西天取经僧继从带到敦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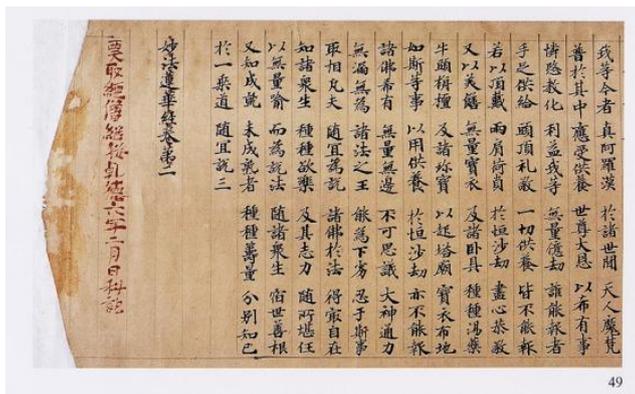


图 1 《妙法莲华经》(BD13802)卷二

展览期间，我经常查阅相关文献，敦煌遗书常常成组出现，因此我认为继从的文献肯定不会只此一件。果然，我们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找到了他的呈文。当时文献定名因循前人，认为是《法华经》的序文。在细致研究之后，我们发现里面内容十分丰富。第一部分，继从根据窥基大师的科分，将《妙法莲华经》科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段。第二部，他分抄录了窥基《法华经玄赞》的序言，认为窥基序言的作用可以和佛经相比，读了就可以“消千劫之灾”，因此把它奉为跟佛经一样的作用。第三部分，他抄录了《杜明福妻灵验记》，《妙法莲华经》的一个灵验故事。“昔时隋帝杜明福妻持莲经一部”。“莲经”就是《妙法莲华经》。“日夜精通，一报身终，生到长安贾相公家为男，年登十八，便为本郡节度使”。杜明福妻因为天天念诵《妙法莲华经》，转世之后，转女成男，并且成为了滑州的节度使。他到滑州南城，突然觉得前生曾在这里住过，就让左右去寻找杜明福。见到了杜明福后问：“你还认识我吗？”杜明福当然不认识。他说：“我就说你前世的妻子。”所以说“经之威力，故得如斯”。“伏惟大王”的“大王”是第四任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当时归义军是半独立的政权，他自己称大王。“赐紫沙门继从”是什么呢？在唐代，三品官员以上才能穿紫色的衣服，从武则天开始对高僧大德“赐紫”，让他可以穿三品以上官员专属颜色的衣服，说明地位很高。因为他是奉赵匡胤的诏令去取经，把窥基的序和《杜明福妻灵验记》传到了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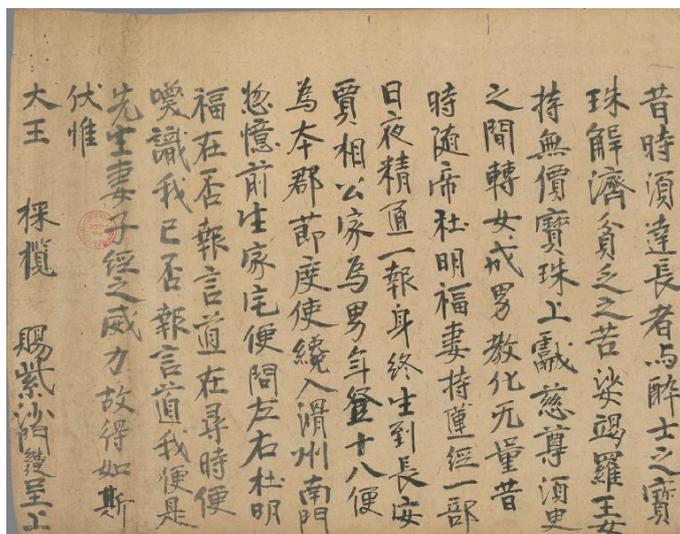


图 2 《继从呈文》(P. 3023)

敦煌佛教为什么可以持续兴盛那么长时间？因为不单有西域的，来自印度的佛教的滋养，也有中原佛教的滋养，所以才能造就如此兴盛的佛教圣地。

《杜明福妻灵验记》的故事在唐代唐临的《冥报记》里也有记载。《冥报记》是后人辑录的，文字内容更加丰富，内容也稍有不同，但是故事的母本是相同的。后来，崔彦武将此事向上司奏明，提议建造寺院，杜明福也把自己的宅子捐献出来建造了寺院，就是明福寺。唐宝历二年（826），义成军节度使兼滑州刺史李听游览这个寺院，得知了故事以后专门让白敏中立碑。这个碑已经残了，但明福寺塔现在还矗立在河南滑县。我后来有机会和国图创新公司同事一同到滑县，登上明福寺塔二层，在这里我讲述了杜明福妻和继从的故事，大家感慨千年前的历史如在眼前。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馆藏的古籍特藏文献都在历史中发挥过作用，回到历史现场再进行研究，就会别有一番认识。

（二）县旷与丝绸之路的草书传承

敦煌也是一个书法的博物馆，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都有。比如说我们馆藏的章草写本《法华玄赞》，也是2014年典籍博物馆首展陈列过的展品。书法家协会的书法家看了章草写本《法华玄赞》后都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精品。我当时在展览部工作，有条件天天在展厅参观，就想查一查为什么敦煌文献当中有六百多件章草写本。为了研究这件藏品，我和赵洪雅也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章草的特点是比楷书书写更快，在唐代速记的字体就是章草。当时玄奘大师自印度取经回来后，白天和弟子们忙于译经，晚上给弟子进行讲解。弟子要把玄奘的讲解记录下来，就采用了当时速记体——章草，后来用章草传承唯识宗典籍，成为唯识宗的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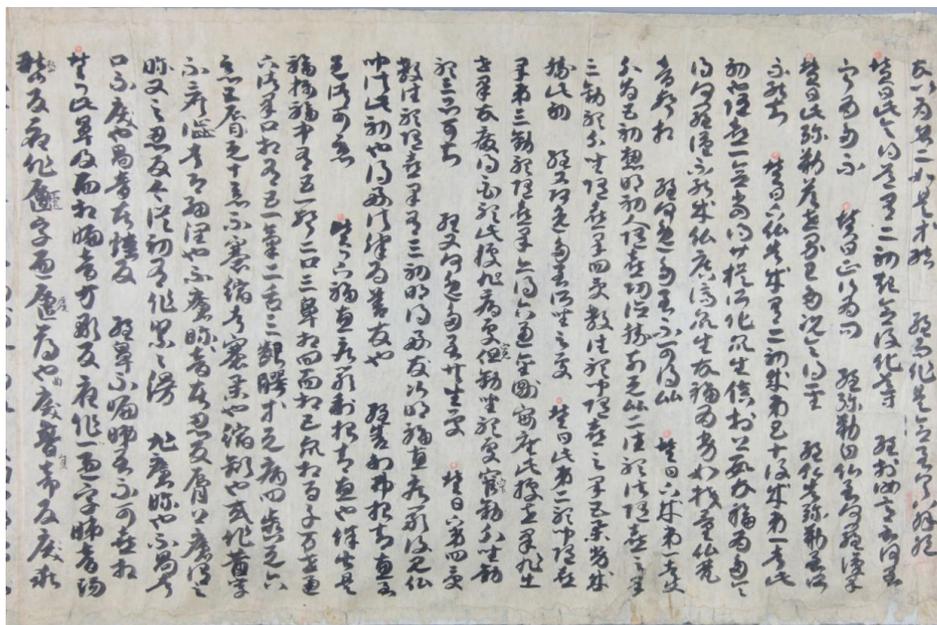


图3 《法华玄赞》（BD14710）

经过仔细研究，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县旷大师。他是河西人，在安史之乱前到唯识宗重镇长安西明寺学习。安史之乱爆发时从长安返回，在河西走廊县旷大师跟着向西撤退的军队和百姓被吐蕃军队一步步地赶到了敦煌。因此，敦煌有如此多的章草，一部分是他从西明寺收集的，一部分是他和徒弟撰写的。因此县旷就成为敦煌地区章草法书传承的关键人物。这也是因为工作而促成的一个研究兴趣点。

（三）武则天写经

武则天从小信奉佛教，曾经在感业寺短暂出家。为给父母祈福，她曾调动中央官署的书手，抄写《妙法莲华经》和《金刚经》各三千部，颁布全国名山大寺。敦煌遗书中保存 54 卷，这是敦煌写经中的翘楚。卷尾题记反映了唐代的宫廷写经制度，写经由门下省、秘书省等中央官署的书手抄写；由书手或写经僧进行三校；最后由高僧大德进行四级详阅，这是现在出版三审四校制度的源头。写经由两位政府官员监制，阎玄道是工部尚书阎立德第三子，阎立本的侄子，世家子弟，因曾担任担任唐太宗丧礼的挽郎，很快得到升迁。

我在学术上比较重要的文章就是研究《大云经疏》的三篇文章。曾经有众多学者对《大云经疏》进行了研究，尤其是意大利的福安敦（Antonino Forte），他的著作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我在西编组工作时，曾阅读过这本英文的著作。阅读之后，我发现他将《大云经疏》翻译成了英文，文中的“又义曰”解释为“佛经的意思是”，但是我读完缩微胶卷后，认为“义”是指代薛怀义这个人，因为《大云经疏》就是薛怀义等十个僧人奉武则天的命令给《大云经》作疏。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些可以提高改进的地方，从文献学的角度写出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当时咱们馆举办第一届科学研讨会，获得了二等奖（当时我馆悬格很高，认为一等奖应该代表国家水平）。又经过不断修改，我将这篇文章分成三篇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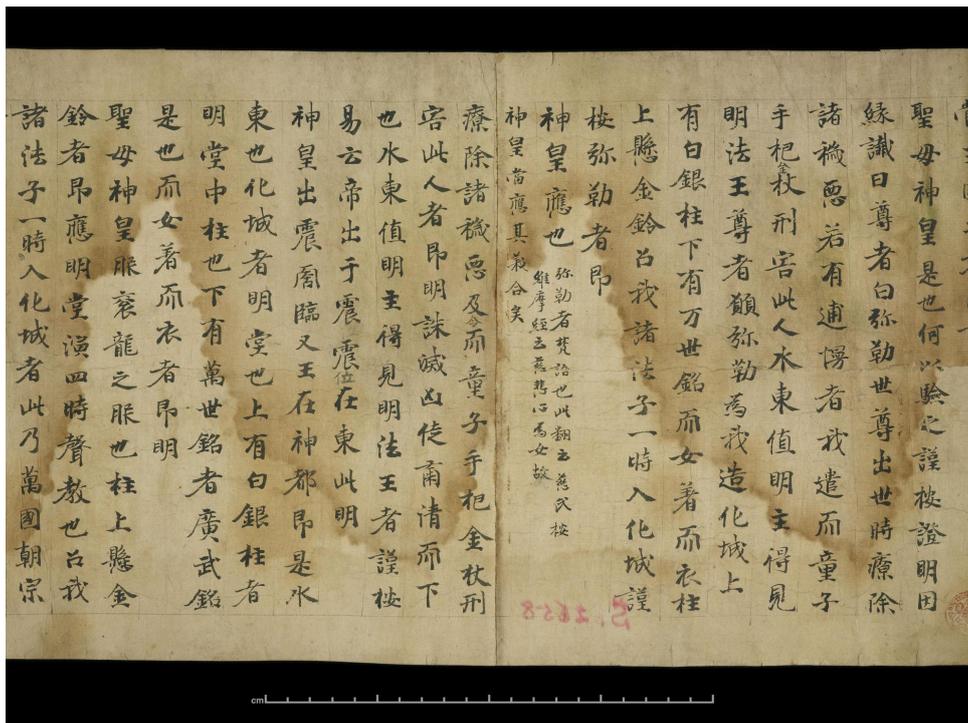


图 4 《大云经疏》（S.2658）

（四）敦煌变文与变相

佛教义理深奥，一般民众仍难接受。古代的高僧大德就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经，而且增加故事情节，创造了敦煌变文，这是后来话本小说的源头。《降魔变文》（P.4524）正面是文字，背面是图像，就像现在的戏剧表演、电影表演字幕一样，法师宣讲时看着文字，听众看图片。因为变文散、韵相间，尤其是韵文部分不能出错，法师为了怕忘记将文字写在正面就可以随时看。



图 5、图 6 《降魔变文》（P. 4524）

我在咱们馆就发现了《孟姜女变文》的残片，和法国的残片可以缀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正面是文字，背面是图像。我和刘波老师也将这个研究写成了一篇文章。后来张新朋老师又从俄国藏品中发现一个可以缀合的残片。

敦煌遗书中《无量寿宗要经》特别多，我们馆保存的就有 900 多件。这是给吐蕃赞普祈福的时候抄写的经文。张议潮建立归义军政权后这些经文废弃了，就把几件《无量寿宗要经》连缀起来，在背面抄写了一部《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它中间都有空格，我当时想这个经文应该是文字和图像相间的。看了《法藏》（P.4524）后，也许当时抄录的底本应该是正面文字，背面图像，可能抄录的人不会画图，就只抄录了文字。敦煌变文走出寺院就成为民间文学，这也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正由贵族社会转向世俗化社会，新兴的庶民阶层也需要他们看得懂、听得懂的文学艺术作品。

（五）敦煌历学家翟奉达写本

研究敦煌遗书，还要结合敦煌壁画进行研究，比如翟奉达的人物形象就保存在敦煌壁画上。敦煌中古时期世家大族占据统治地位，比如曹家、张家还有翟家。敦煌研究院在北京举办的敦煌艺术大展，复制了几个石窟，其中包括 220 窟，就是翟奉达的家族窟。他的八代祖先在唐贞观年间建造了 220 窟，翟家世代守护，一直到五代已经传承了 200 多年，仍然在不断维修。翟奉达就是在同光年间维修之后，将自己作为供养人画在了石窟当中。

翟奉达世代簪缨，到了他这一代是敦煌著名的历学家，他家世代供奉了一部盛唐时代抄写的《金刚经》（P.2094）。每次看到敦煌的卷子我们都要有问题意识。正常的敦煌遗书都只有一个护首和一个外题，但是这个卷子上有两个。这就是我们要解释的问题。另外就算有两个外题内容也应该一致，但是这个卷子却不一样，第一个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赞验功德记》，另一个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兼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它们的文字不同，涵盖的内容也就不同。大家注意这件写卷前的缥带，我觉得这个缥带做得特别好，中间文字隔开，保证捆绑的时候不会遮挡题目的文字，这就是古代的工匠精神。



图7 《金刚经》（P. 2094）

《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是全称，《验功德记》是简称。为什么全称中少了一个“赞”字呢？《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这个卷子中，有一个被涂抹掉的“奉达书”，为什么被涂抹掉了？有的卷子抄写的时候为什么不是接续的，而是突然中断，另起一行呢？还有的卷子上同时出现了朱圈和墨圈，又是为什么呢？现在敦煌学最前沿的写本学所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

比如刚刚说的《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在抄写之后又发现了几个灵验故事想要补充进来，就只能把纸从中剪开，文字没有办法接续就出现了空行。再比如“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为什么把“开元皇帝”涂抹掉？“赞”就是“赞金刚经功德”，在另一个外题之中缺失了，这个原因就要从大量的敦煌文献中寻找开元皇帝和《金刚经》之间的关系。唐玄宗写了《御注金刚经》，注完后高僧大德就开始写《赞开元皇帝注金刚经》，实际上这个“赞”并不是开元皇帝写的。我们从馆藏《房山石经》拓片上找到相关的记载。在唐玄宗御注《金刚经》后，很快在洛阳敬爱寺里举行了一个法会迎接《御注金刚经》，在仪式上宣读的赞文就是应该是这篇。

《金刚经》正文部分纸的颜色与其他不同，证明这是盛唐的写本。翟奉达的祖先在贞观年间建了220窟，这个唐代的抄本有可能就是当年抄写的。之后世代传承，到了翟奉达的时期，他把当时能搜集到的灵验记和《开元皇帝赞金刚经》都收集起来，抄成了一卷，接裱在《金刚经》前面。又过了若干年，他发现了几个故事没有收录，就重新插补进来。这时文献性质就发生了转变，从普通的传抄变成了编辑，因此背题的内容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最初没有护首，在正文背面题写外题。但是他怕正面文字磨损，又加了一个护首。因为他对原有的内容已经不了解了，因此外题的文字也就没有了“赞”。



图8 《金刚经》(P.2094)

我们馆有一个很有名的《逆刺占》，是翟奉达二十岁的时候抄的。他抄完后还写了一首诗。《甲申岁具注历日》是他编写的历书。在唐代，一般百姓不能编写历书，只能由政府编写之后交于集贤院抄写后颁发，因此格式非常严谨。这个卷子的正面是《毛诗传笺》残卷，背面抄写《逆刺占》一卷。

我们馆、天津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有一组翟奉达为夫人十斋追福抄写的佛经，分别是七七、百日、一周年、十周年，一共抄写了十部。当时的人认为死后要经过十王审判，每过一个王他就要抄写一部经，保佑他的夫人顺利过关。

我们馆藏还有梁启超的手稿。梁启超是我们馆第十六任老馆长，十几年前我在手稿库看到了梁启超为夫人病重以及去世后每斋抄写的《妙法莲华经》。这两部经文就证明了我们的传统古今相应，绵延不断。

(六) 道真补经与藏经洞文献的来源与性质

胡玉清老师是敦煌遗书的修复高手，二十年前她在修复《法华经》(BD02549)，从背面揭下一张古代裱补纸。裱补纸上有一首五言打油诗：“忍辱修真宝，嗔他逆福田。高心不(补)者(这)经，是他曹家经。”这是学士郎修补《法华经》时顺手写的打油诗，这是敦煌遗书常见的学郎诗。从此我们开始关注敦煌遗书的古代修复。因为古代的修复历史资料很少，很难开展研究，当时的修复工匠文化程度不高，几乎没有修补的方法或者记录保留下来，因此敦煌遗书为我们留下了原汁原味的修复案例。根据馆藏《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卷中道真的发愿文，道真曾在长兴五年(934)曾发起修复三界寺藏经的活动：“长兴五年岁次甲午六月十五日，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经论，部秩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弘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

我们馆之所以能有如此多的《大般若经》，大多数都是道真从各个寺院收集来的。当时不像现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可以通过检索确定残经片属于哪一卷，在2000年前得一一通读大藏经才能找到其所属卷次。道真经过考订，在残卷的背面写下“第卅五秩 恩第二卷”的勘记，说明是位于《大般若经》卷三四二的残片。第卅五秩包含卷341—350，它是这里面的342卷。道真之所以考订《大般若经》的卷次，就是为了将来的配补和修复。施萍婷、荣新江、张涌泉等先生都认为道真补经与藏经洞文献密切相关。我们的系列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些先生的观点。

敦煌是个偏僻的地方，在五代已经衰落了。白居易当时在东都洛阳，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当时他要为香山寺造一部藏经，也是“于诸寺藏外杂散经中，得遗编坠轴者数百卷帙，以开元经录按而校之”，拾遗补缺，编成了一部香山寺的经藏。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

脊梁。”道真和尚、白居易等古代修经人为修复写经“埋头苦干”“拚命硬干”，正是“中国脊梁”的写照。没有道真的修复工作，也就没有敦煌藏经洞的数万件写经；没有古代像道真一样的修书人，我们就不会有现存3000多万册的古籍。

（七）佛教对中国书籍装帧形式的接受与改造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对中国装帧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汉时期是简帛时代，虽然佛经没有保留下来，但根据竺法护翻译的佛经，可以看到刚传入时应该用竹木简书写的。现存最早的纸质写本佛经是西晋元康六年（296）竺法护所译《诸佛要集经》，反映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采用中国传统装帧形式卷轴装，反映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同时佛教也学习模仿印度的梵夹装。因为经文是梵文，上下有两块夹板，所以称为梵夹装。敦煌遗书中的梵夹装则是中国化的梵夹装，第一个改变是经文不再是写在贝叶上，而是写在纸上；第二个改变是经文是用汉文书写的。但是纸十分柔软，穿绳容易磨损，打开也不方便。佛教界的人就开始改革，如同《楞伽经疏》（S.5603）一样，原来拟作的梵夹装，中间穿孔，但是没有把每张书叶裁开，前后加装书皮，这样中国的高僧大德创新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装帧形制——经折装。

三、珍惜：学海无涯，继往开来

前面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研究的经历，特别是在工作中发现可以深入研究的兴趣点，进而通过爬梳文献、请教大家，和同仁合作完成了一些涉及敦煌文献内容、形制、书法、历史等诸多内容的研究。敦煌文献作为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值得大家深入了解、研究。

我第三个想要表达的肯定是珍惜，一定要珍惜我们的工作机会，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同事。佛教讲：“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大家在一个办公室，在一个科组工作，要珍惜这个缘分，互相学习。我们这个时代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资源条件，继承前辈开拓的学术研究方法，将工作与研究兴趣相结合，方能成就有价值的事业。

编后记：本文为林世田先生为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年轻同事们所作培训讲座内容，由黄姗整理，林先生修订。勤勉谨慎、好学深思，善从工作中发现研究对象，林先生的讲座与其他古籍馆前辈同仁的培训交流，共同滋养着新生代的古籍从业力量。故此发表，共同学习。